

共產國際檔案  
最新解密  
毛澤東  
毛澤民  
兄弟關係

# 革命与爱



# 革命与爱

共产国际档案最新解密  
毛泽东毛泽民兄弟关系

耘山 周燕 著  
周燕 执笔

(京)新登字08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革命与爱：共产国际档案最新解密毛泽东毛泽民兄弟关系/耘山，周燕著.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3

ISBN 978-7-5006-9828-9

I.①革... II.①耘... ②周... III.①毛泽东(1893~1976)—生平事迹②毛泽民(1896~1943)—生平事迹 IV.①A752②K827=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33771号

责任编辑 吴晓梅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

社址：北京东四12条21号 邮政编码：100708

网址：www.cyp.com.cn

编辑部电话：(010)57350521 门市部电话：(010)57350370

三河市君旺印装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700×1000 1/16 28.75印张 465千字

2011年4月北京第1版 2011年4月河北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册 定价：47.00元

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010)57350337

## 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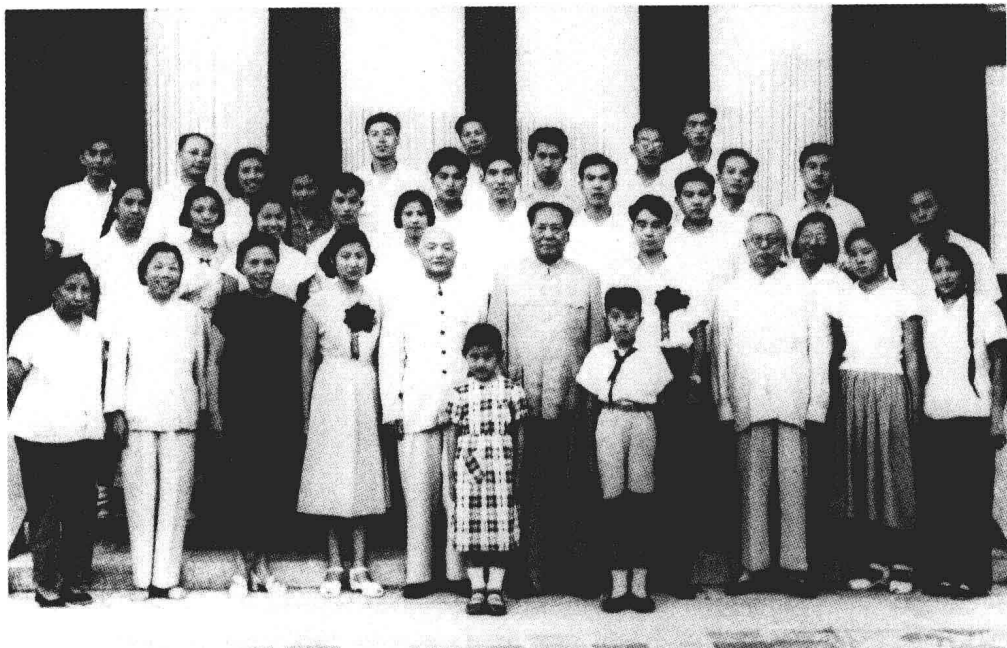
### 跨越时空的追问——毛泽民远赴莫斯科的真实使命

1959年8月29日，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日子。

那天下午，母亲毛远志说要带我和妹妹去中南海春藕斋看电影。奇怪的是，她让妹妹穿上最漂亮的连衣裙和红皮鞋，还为我从头到脚精心地收拾了一番。当时，父亲在中南海工作，去那里看场电影是件平常事，本不用这么隆重。直到进入丰泽园颐年堂，我才知道，原来我们要参加李敏姨妈的婚礼。主持婚礼的正是我们日夜想念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那天，毛主席很高兴，谈笑风生地与母亲说了一阵很难听懂的家乡话。他还摸摸妹妹的头、拍拍我的肩膀，鼓励我们好好学习，将来成为建设祖国的栋梁之材。整个下午，我就像在梦中度过的；嗓子像被什么东西噎住一样，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睁大眼睛看着毛主席。

婚礼结束前，毛主席与宾客们在院子里合影留念。他热情地招呼我和妹妹紧



1959年8月29日，毛泽东主持女儿李敏的婚礼。  
前排儿童为耘山（右）、立亚；三排右二为耘山的母亲毛远志。

靠在他的身前。从那张珍贵的照片上看，我站得笔直，端正得就像是毛主席身边的一名小卫兵。

后来，听李敏姨妈说，那天参加婚礼的客人是由她和姨父孔令华提名、毛主席做主定下来的。毛主席特别关照她：“泽民二叔的女儿——你们的远志姐姐，是一定要请的。”

那时，我还是一个顽皮的小男孩，懵懵懂懂的，只知道母亲姓毛，是湖南韶山人，可能是毛主席的什么亲戚。但真正搞清母亲与毛泽东一家究竟是什么血缘关系，还是在1965年春天。

那年，空军飞行部队在北京应届初中毕业生中招考飞行员，我报了名。“选飞”的条件非常严格。我连续通过了好几道体检关。就在最后填写政审表时，却把我难住了。在“家庭和社会关系”一栏，不仅要填写在世的直系亲人，还要写明祖宗三代。

母亲为人处世一直很低调，甚至还隐姓埋名。对外交往时，她自称“阮志”。在儿女面前，她也很少谈论毛家的事。就连我们兄妹和毛主席在一起的照片，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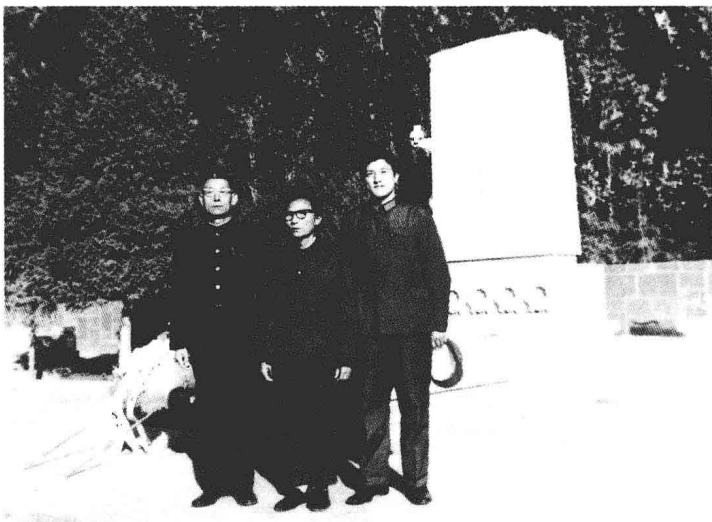
被她锁在柜子里，不拿给我们看。她是担心我们因是毛主席的亲戚而产生优越感。但这次我要考飞行员，如实地填写政审表是对组织负责的大事。母亲和父亲认真商量后，由父亲郑重地为我填写了这份政审表。表里有一栏清晰地写着——外祖父，毛泽民，中共党员，1943年9月27日在新疆牺牲；外祖母，王淑兰，中共党员，1964年7月6日在湖南病逝。

当一名飞行员的梦想最终与我擦肩而过，但我却由此知道了母亲毛远志的血缘脉络。从此，我倍加努力，一言一行都要为毛主席争光，为毛家的烈士们争气。



1979年春天，耘山在高平阵地。

1968年，我应征入伍，并主动要求到野战军的步兵连队锻炼，经历了从战士到班、排、连、营各个军阶，参加过城市“支左”、围湖垦荒、战备施工、军事集训、野营拉练、战备值班等诸项军事行动，还特别经历了枪林弹雨的生死考验。



1983年9月，耘山与母亲毛远志、父亲曹全夫在乌鲁木齐烈士陵园毛泽民烈士墓前。

1979年，我所在的部队参加了中越边

境自卫反击战。每当看着一个个年轻的生命在自己身边英勇地倒下，一种不可言状的慷慨和悲壮在我心中升腾着，仿佛我也站在了毛家先辈的战斗行列中。一种强烈的欲望冲击着我的心灵：如果，我能活着回家，我一定要更多地了解外公毛泽民，这辈子要活个明明白白，否则在战场上“光荣”了，连自己的列祖列宗都不了解，那该多遗憾啊！

1983年秋天，我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高级指挥参谋班毕业了。在奔赴新的工作岗位之前，恰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为陈潭秋、毛泽民、杜重远、林基路烈士牺牲40周年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我便随父母一起来到乌鲁木齐。

这次纪念活动留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那些当年曾被盛世才关进监狱的、仍在新疆工作的老同志都去了，还有他们的家属。大家从早到晚都在谈论当年在新疆经历的事情，谈他们在狱中的斗争，谈回到延安的喜悦心情。我们通过瞻仰毛泽民烈士故居，参观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祭扫烈士陵园，特别是查看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烈士陵园纪念馆珍藏的档案资料和《新疆烈士传》，才真正了解了毛泽民在新疆的工作，才知道他是怎样被捕的，他的牺牲又是何等壮烈。我们甚至得知，江西赣南有个铁山垅，毛泽民在中央苏区担任国家银行行长时，还兼任过中华钨矿公司总经理。真没想到，我的外祖父毛泽民还做了那么多鲜为人知的事情！

长期以来，我的母亲毛远志无时无刻不在思念自己的父亲毛泽民，她的心一直浸在泪水之中。母亲出生前，她的父亲便跟随毛泽东参加革命，到处奔波，出生后，也很少见到。对父亲，她脑海中只有依稀的印象。16岁时，她被父亲召

唤到延安参加革命，而那时，父亲自己却已离开延安去了新疆。在8年的漫长岁月里，她日日想、夜夜盼，最后等来的却是父亲牺牲的噩耗。这次，一到乌鲁木齐，母亲触景生情，十分动情。当她踏过“毛泽民烈士故居”的门槛时，迎面看见一个坐着烧水壶的灶台。她停住了脚步，泪流满面，说：“爸爸，在您生前，女儿没能亲自给您做一次饭、烧一杯茶……”此情此景，感动了周围所有的人。

这一年，母亲已经61岁了，对她来说，来新疆的机会实在难得。纪念活动结束后，母亲又在乌鲁木齐停留了三周。她与我父亲一起抄写了许多有关毛泽民的档案资料。

从那时起，我们一家两代人就在母亲的带领下，开始了艰辛的寻踪之旅。我们沿着毛泽民的足迹，从老家韶山，一路追寻他从事革命工作的许多地方，长沙、安源、广州、上海、武汉、天津、闽西、瑞金、遵义、陕甘宁、新疆……经过20多年的寻踪、搜集和考证，逐步梳理出毛泽民革命之路的奋斗历程。

那时，我还是一名现役军人，没有更多的精力和时间去潜心研究外祖父毛泽民。直到2000年，一位在中国人民银行工作的朋友非常热心地提示我：毛泽民是我党金融工作的老前辈，可称得上是新中国银行业的“开山鼻祖”了，作为后人，你应该为毛泽民做一些有益的事情。朋友一席话对我触动很大。我第一次开始认真地为毛泽民做事。在大半年的时间里，我利用工作间隙，一口气跑了天津、湖北、上海、广东、湖南、江西、福建、贵州、陕西、新疆等10多个省市，把毛泽民战斗生活过的地方走了一遍，寻找资料，拍摄照片，寻访知情者。在中国人民银行领导和机关的大力支持下，2002年底，由中国人民银行署名、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发行的、一部反映毛泽民革命生涯的大型彩色画册《毛泽民》终于问世了。

在这个过程中，我更深入地思考了一些问题：毛泽民是我党红色经济的重要开创者，是我党早期红色理财专家，这一点已毋庸置疑。但作为毛泽东的亲二弟、中共早期党员，毛泽民在党内重大斗争中的政治立场到底怎样？难道他就是一个埋头拉车的“老黄牛”？我们曾听到过这样的议论：在王明“左”倾路线统治期间，毛泽东与他的小弟毛泽覃两人都挨整，为什么毛泽民会相安无事呢？有人甚至怀疑，毛泽民与大哥毛泽东是不是持有不同政见。对此，我们所听到的、所能找到的反驳意见，只有他当时的大嫂贺子珍的一句话：“如果连泽民都整了，红军还要不要吃饭？！”显然，这句话并不能打消人们的疑虑。

## 二

2004年8月初,《作家文摘》转摘了作家卢弘撰写的《李德曾对在华错误做过检查》一文。其中披露了一个重要情况:1939年12月底,毛泽民参加共产国际监委召开的审查和处理李德问题的会议,并在会上有发言。文中引用了李德《中国纪事》一书中的两段话:

12月,我应邀同中共代表进行了几天交谈,其中除周恩来外,还有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毛泽民把许多罪名无理地归咎于我……周恩来坐在一旁,像是“原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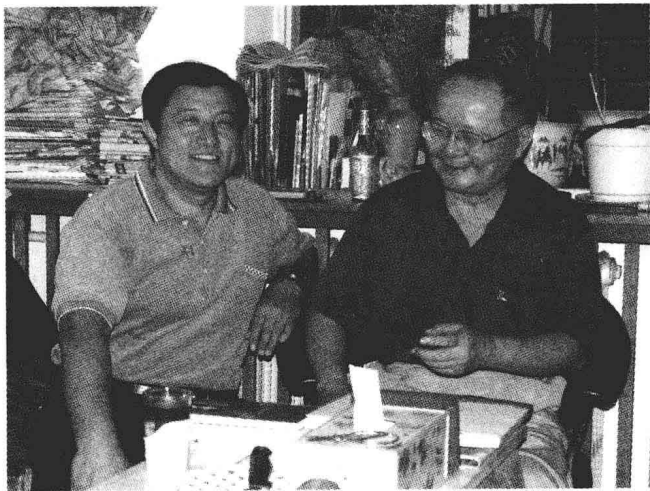
后来我多次听说,周恩来和毛泽民受了毛泽东的委托,要在莫斯科把我当做“人民的敌人”开除出党,如有可能还要把我消灭。

过去,我们只知道毛泽民曾在1939年夏天去莫斯科学习和养病,并不清楚他参加了这样的批判李德的斗争。真没有想到,毛泽民的革命经历还与我党一段重要历史有联系。我的精神为之一振!

《李德曾对在华错误做过检查》一文的作者卢弘,曾经是《解放军报》的记者,就住在北京。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没想到知情人竟在眼前!我设法找到了卢弘的住处,很快拜访了他。

眼前的卢弘是一位年逾古稀的离休干部。他个头不高,圆圆的脸泛着红光。他的言谈很风趣,还常常助以手势,仿佛他本人就在故事的情节之中。

在交谈中,我得知,卢弘是一位经历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和抗美援朝战争的军旅画家,曾在军内外报刊、书刊中发表过大量的美术作品。“文革”初期,因为他发表在《解放军报》的一幅大批判漫画,便成了



2004年9月,鞍山拜访作家卢弘(右)。



“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反革命分子”。后来，在“批林批孔”高潮中，卢弘把重走长征路当成“避风港”，他与《解放军报》的几位摄影记者一起去旅行写生。一路上，他画了许多画，收集了许多材料，一个与党中央领导层一起走完长征全程的、唯一的外国人——李德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发现，如果没有李德，很可能就没有这次长征。从那时起，卢弘便对李德产生了特别的兴趣。

卢弘的岳父伍修权将军，是当年李德身边的俄文翻译，又与博古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目睹耳闻了李德在中央苏区、在长征路上几乎所有的活动。这使卢弘有获得第一手材料的机会。

与卢弘交谈，我最渴望的还是更多地了解有关毛泽民发言的情况。卢弘却眯着眼睛，十分谦逊地说：“我知道的也就是书上写的那些。”说着，他从书柜中取出一本他的著作《“洋钦差”李德外传》送给我。

当我翻开《“洋钦差”李德外传》，认真寻找书中有关毛泽民的内容时，却感到很满足。李德对毛泽民的态度如此耿耿于怀，那么，毛泽民在发言中都说了些什么呢？书上对此却未展开，只写他讲了一连串后来大家都知道的数字。如，因为当时临时中央的“左”倾错误，白区损失百分之百、苏区损失百分之九十以上，比李立三路线时的损失还大，等等。

为此，我曾请教过卢弘老师：“毛泽民在批判会上的发言就讲了这些？”

卢弘非常爽快地回答说：“那是我推测的！你想，我当年研究李德，什么资料都没有，全是一点点积累起来的。对于毛泽民更是一无所知。我想，毛泽民是搞经济的，整天拨拉算盘珠，对数字最感兴趣，我就把这段‘关键词’用在了他身上。刘亚楼是带兵打仗的，火气大，我就给他安排了‘发火’、‘炮轰’等内容。”

闻听此言，我不禁笑出声来。卢弘兼有画家和作家的双重身份，他的文字中带有画家的想象与洒脱，画中又蕴含着文人的豪放与沧桑。

我非常感谢卢弘老师——经过他艰苦的文学劳动，不遗余力地从尘封的历史中，把这个给中国革命和中国工农红军带来巨大损失的“洋钦差”挖掘出来，使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史增添了更加曲折而浓重的色彩，也使毛泽民在莫斯科的点滴活动线索浮现在世人面前。

可以说，卢弘的文章为我出示了路标——去莫斯科，寻找毛泽民的足迹，揭示尘封历史背后的真相！

### 三

诚然，保存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РГАСПИ）中的当年共产国际的档案资料被逐步解密后，才为我查找有关中共历史档案提供了方便与可能。但怎样去莫斯科？怎样才能找到有关毛泽民的档案资料呢？这对一个俄文字母都不认识的我来说，真是难上加难！正当困顿之时，一位朋友向我介绍了中共早期负责人李立三的女儿李英男教授。

60岁开外的李英男是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她出生在莫斯科，20世纪60年代初回到中国。她长期从事俄罗斯历史、社会与文化方面的教学与研究，对俄罗斯的情况非常熟悉。

听说李教授近期就要去莫斯科，查找她父亲的有关档案资料，这对我真是绝好的机会！毛泽民和李立三都是中共湖南早期党员，又同在安源路矿工作过。我当即拨通了李教授的电话。当我自报家门后，她非常痛快地答应了我的请求。由于时间太紧，她根本顾不上与我见面，带着我传真给她的委托书，就出发了。

数周后，李教授从俄罗斯回来了，还带回一叠毛泽民档案资料的复印件。李教授告诉我：“毛泽民档案卷宗里的材料不少，因为来去匆忙，中文件我基本带回来了，俄文的东西，就挑了几件。”

李教授所说的“中文件”，主要是指毛泽民档案卷宗中的中文手稿，是毛泽



2004年8月，耘山与李立三的夫人李莎（中）、女儿李英男（右）合影。

民留在莫斯科的真迹。其中有：毛泽民亲笔撰写的《个人简历》、毛泽民《关于过去肃反工作中的片断材料》和《关于博古、李德等同志领导党和红军的错误问题》的报告，有王松（刘亚楼）、李进（林彪）、周全（毛泽民）写给共产国际的《关于中国党在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中的错误问题》的报告，还有毛泽民写给共产国际执委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两封亲笔信件，以及共产国际干部部负责人为毛泽民在莫斯科期间的工作表现所作的评语，等等。

李教授出国前，我想如果能找到毛泽民在批判李德的那次会议上的发言就不错了，没想到她找回这么多的东西。我真是喜出望外！

这里我要特别说明的是，共产国际档案解密后，中央党史部门曾从莫斯科找回一大批档案资料，其中就有毛泽民《关于博古、李德等同志领导党和红军的错误问题》的俄文件。这篇文章由马贵凡先生翻译成中文，曾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专业刊物《中共党史资料》2003年第2期发表过。也就是说，这份文件经过了中译俄、俄译中两个过程。而李教授找回的，是由毛泽民亲笔书写的中文原件。

008

我激动地翻阅着外祖父毛泽民的中文件档案资料，脑海中跳动着一个个惊奇，心中或明或暗地闪现出一个个疑问。有时，我甚至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些东西真的都是毛泽民自己写的吗？越看这些材料，我越感到毛泽民1939年的莫斯科之行非同寻常。那么，在毛泽民莫斯科档案卷宗中，那些我还没去找的俄文件又会写些什么？在另一些不为人知的档案卷宗里，是否还能找到更令人出乎意料的东西？这些档案又能揭开深埋在历史深处的毛泽东、毛泽民兄弟之间哪些尘封往事？我想，只有找到更多的材料，才能完成解密毛泽民1939年莫斯科之行的真正使命。

#### 四

2005年7月16日清晨，我终于登上俄航SU754班机，飞往我从小就向往的伟大苏联的首都莫斯科。说实在的，我去过北美和欧洲的许多地方，去莫斯科还是第一次。

这时正值莫斯科最好的季节，国内出访、考察的团队很多，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的住房一时比较紧张。我是自费出国，也不可能带翻译。使馆负责接待的同志把我安排在价格便宜的半地下客房。房间虽然很小，但条件还算不错，有卫生

间，也有电视机。

到莫斯科后，我给自己确定了四个目标：第一，在已经解密的俄罗斯档案中，尽可能多收集有关毛泽民的文字资料，哪怕是一张小纸片也不漏掉；第二，寻找与毛泽民有关的历史影像资料；第三，寻找毛泽民在莫斯科住过的几个地方；第四，最好能找到当年的知情人，或听说过当年事情的一些人。当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在莫斯科工作的朋友时，他们都感到很困难，认为这是大海捞针。当时我想，就算是大海里捞针，也要试着捞一捞。

按照李英男教授的预先指点，我首先来到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拜见著名的史学博士乌索夫研究员。

乌索夫博士70岁开外，中等身材，身体很硬朗，待人谦逊而热情。从他办公室里悬挂的中国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的肖像，就可以看出他对中国感情之深。乌索夫精通汉语，写了不少有关中国历史的书籍。他对毛泽东一家情况也很清楚，与他交谈显得很轻松。关于我要查阅共产国际有关档案一事，乌索夫提出很好的建议，并答应亲自带我到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去办理查阅手续。

谈话间，乌索夫向我介绍了他的一位同事——82岁的卡尔图诺娃研究员。这位俄罗斯老太太见到我就像见到亲人一样，亲热地与我拥抱。原来，卡尔图诺娃与毛泽东家的好几位亲人都有过亲密的交往。苏联卫国战争胜利后，她曾是毛岸英兄弟在东方大学的同窗。1949年，江青带女儿李讷到苏联养病时，苏共中央联络部派她担任江青的翻译。老人带我来到她的办公室，拿出她珍藏的十余张当年与江青等人的合影照片，还有江青写给她的亲笔信。半个多世纪以来，老人一直关注中国的情况，特别是毛泽东一家的情况。

虽然身在异国他乡，我却像回到家里一样。我把从中国带来的纪念毛泽东110



2005年7月，耘山向俄罗斯科学院远东所专家赠送毛泽民画册。  
左起：耘山、卡尔图诺娃、孙东宁（中国驻俄使馆副武官）、乌索夫。



卡尔图诺娃（中）保存的与江青、林利（左）在莫斯科的合影（1949年）。

周年诞辰的邮折和《毛泽民》画册送给两位研究员。我还在莫斯科东方红酒楼请他们吃了一顿中国饭，两位老人的脸上始终荡漾着喜悦的笑容。

与乌索夫见面后的第三天，我们相约来到莫斯科德米特罗夫卡大街（原普希金大街）15号——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档案馆大门上方镶嵌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雕塑头像，显得格外庄严。这座档案馆是在原苏共中央档案馆的基础上建立的，其前身曾是第三国际档案馆（1919—1943年）。1991年

8月24日，根据俄罗斯联邦总统命令，苏共档案馆中全部档案被收归国家所有。同年12月，国家档案馆正式对外开放。

乌索夫首先带我来到大楼的五层填写报告，办理好出入证，又带我去四层查阅共产国际档案索引本，并在电脑上查找资料目录，为我订阅了毛泽民的档案，以及共产国际与毛泽民有关的档案。他为我填写好借阅申请单，约定了阅读日期和时间。看到老人跑上跑下一丝不苟的样子，我心中充满了感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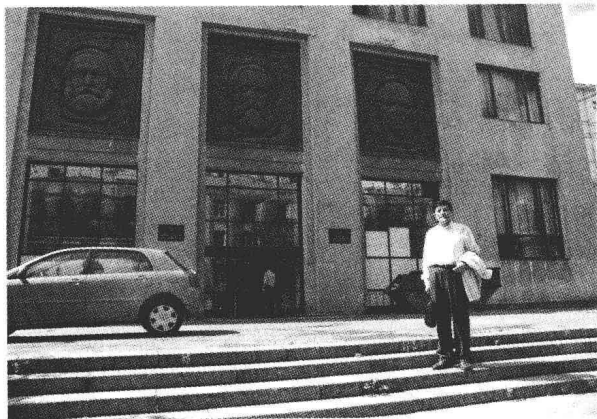
我如期来到国家档案馆，领取了编号为495/225/477的、写有МАОЦЗЕ-МИН字样的档案卷宗。当我走进静悄悄的专为外国人开放的阅览室时，“目不识丁”的我，心里不停地打鼓——下面我能独立完成预期的工作吗？

环视四周，我发现有两个学生模样的女青年一前一后，坐在那里专心致志地看材料，其中一位是黑头发的亚洲人，我便轻手轻脚地走近她们。说来也巧，那位黑头发的女青年竟是毕业于北京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名叫刘震霞。当她看到身边突然出现了一位中国同胞时，喜不自禁。她高兴地把坐在身后的美国女孩介绍给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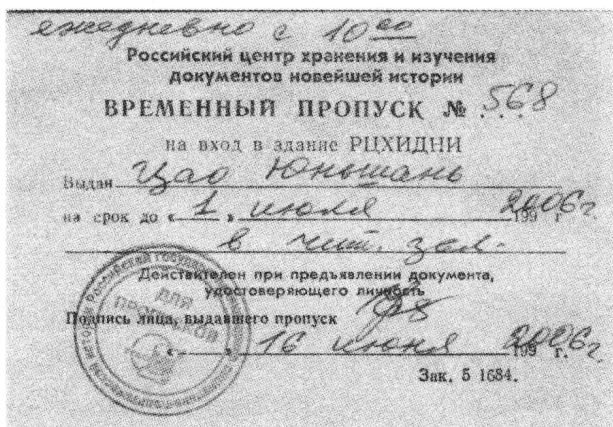
这个女孩是美国哈佛大学的硕士，伯克利大学的博士，她还有一个好听的中国名字叫马意莉。她正在撰写的博士论文也很有意思，专门研究20世纪20年代至60年代中国留苏学生的情况。我们都知道，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留苏学生中的许多人，后来成为了中国革命的领导人和开国元勋；40年代的留苏学生有的已进入中国当代最高领导层；50年代至60年代的留苏学生则成为新中国科学技术和经济建设的中坚。据说，马意莉在这里已经看了好几个月的材料，对查阅档案非常有经验。她的汉语和俄语都很好，很愿意为我提供帮助。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馆标



2005年7月，耘山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门前。



2006年6月16日，耘山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办理的借阅证。

档案卷宗里的东西就越多，也越完整。

毛泽民从1939年6月初到达莫斯科，1940年1月22日离开，在苏联境内停留了8个多月，仅存入档案卷宗的批件就有二三十份，其中有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和苏联内务人民委员贝利亚批准他入境的批件；有季米特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即是共产国际领导下的一个支部。这座档案馆里存放着我党早期大量的档案材料。几乎每一位在苏联学习、工作或养病的中共党员，这里都会为他（她）建立一份档案。从本人填写的详细的履历表到手写的一张纸片，都会完整地存放在他的档案袋里。当然，越是重要人物，档



耘山在档案库里查找到尘封65年的毛泽民档案。

洛夫指示共产国际书记处，向毛泽民提供中共有关重要历史文件的批示，还有毛泽民在柳克斯饭店（共产国际公寓）的出入证、克里姆林宫医院的挂号证，等等。把这些批示和证件的签署日期联系起来，毛泽民在莫斯科的整个行程，便清晰地展现在我的眼前。

翻阅毛泽民的档案资料，让我感到非常吃惊：当年中国同志在苏联学习的条件是何等艰苦。毛泽民的一份三四页的报告用的都是不同规格的纸张，有格纸，也有白纸；一份写给共产国际的12页的正式报告，用的竟是作废的书写纸的背面。

随后，我又查阅了与毛泽民有关的毛泽东的档案卷宗。毛泽东的档案有15卷，绝大部分是中共递交共产国际的毛泽东的讲话和著作的俄文翻译件。其中一份资料让我特别好奇，那就是毛泽民为毛泽东代填的《个人简历表》。浏览这份长达四五页的《履历表》，我有许多惊奇的发现，如：过去只听说毛泽东母亲的名字叫“文七妹”，毛泽民此处却清清楚楚地填写着“文素勤”。

这一天，因为要查阅的资料很多，中午我没有休息。马意莉和刘霞霞也没有离开阅览室。她们每人带了一份三明治和一瓶水充做午饭。据说，这几个月，她们都是这样。看来，她们真正是在艰苦地做学问。

出国前，我的父亲曾嘱咐我：“毛家是一个大家庭，是一个整体。你这次去俄罗斯机会很难得，如果能找到贺子珍和毛岸英兄弟的材料也一并带回来。”按照俄罗斯国家档案馆的规定，查阅个人档案必须是本人的亲属。而那里的工作人员得知我的身份后，热情地为我提供了方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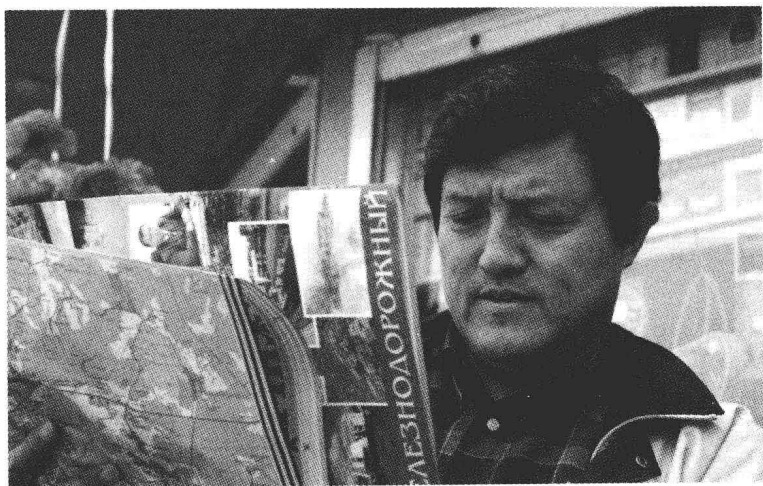
就这样，我白天在档案馆查阅资料，晚上回到大使馆半地下的小屋里整理资料和照片，以便从中寻找新的线索。逢双休日档案馆休息，我就去寻找毛泽民在莫斯科住过的地方，顺便领略俄罗斯的自然风光和古老文化。

去莫斯科之前，我曾在杂志上看过林伯渠的女儿林利撰写的文章。她在苏联学习和生活过，对中国党校的情况比较了解。在红军时期，毛泽民长期与林伯渠一起工作，还肩并肩地走完了两万五千里长征路。对于我的造访，85岁的



2005年7月，耘山在俄罗斯国家档案馆巧遇美国女学生马意莉。





耘山在地图上寻找位于莫斯科郊区库其诺区的中国党校旧址。

林利老人显得格外高兴。

014

老人回忆说，1939年夏天，毛泽民在库其诺区的中国党校七部居住过，时间不长。老人告诉我：“当年，莫斯科的铁路交通很方便。我们从库其诺去莫斯科，都是乘坐火车，再换乘地铁进入市区。”她还向我描述了党校周边的自然环境，有小河、有树林……

为了按照林利提供的线索我寻找位于库其诺的中国党校分部遗址，使馆的朋友帮我介绍了一位熟悉莫斯科交通并精通俄语的中国小伙子。然而，要在偌大的莫斯科郊区寻找70年前的遗址，绝非易事。凭着军人特有的潜质，我决定从寻找库其诺火车站入手，然后再确定党校的具体方位。

库其诺现在叫“铁路市”。150年前修建的老车站还保留着当年的风貌。古老建筑的门楣上方嵌着“КУЧИНО”的俄文字样。我在车站边的报亭买了一张当地的市区地图。地图标得很细，加之俄罗斯地域广袤，旧建筑一般不拆，这给我寻找旧址提供了方便条件。

我们沿着一条小河，走进一片树林掩映的村庄。几经打听，终于找到一座庄园式的院落。旧主楼的东墙上还保留着一幅卫国战争时期的宣传画，旁边的石碑上记载在卫国战争时期这里曾是一所野战医院。我想，当年中国党校分部的生活保障由红色救济会负责，在这里学习、养病的中国学员在1940年春天就毕业离开了。1941年夏天，苏联卫国战争爆发后，红色救济会在这里设立野战医院是完全可能的。